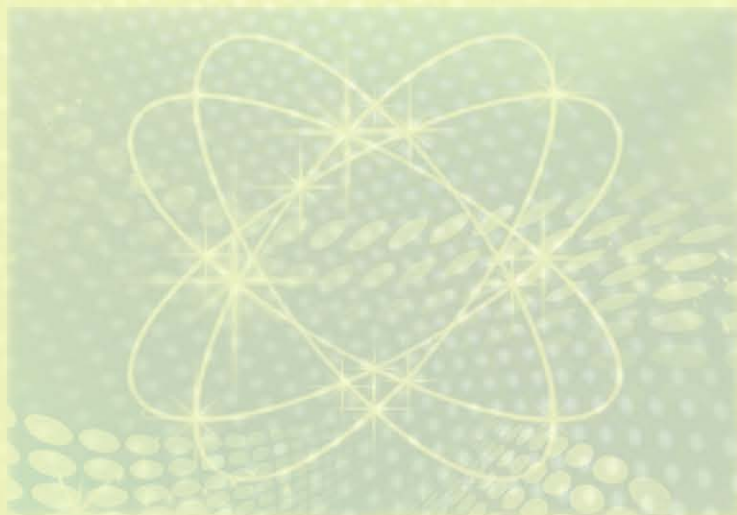


新时期小说与民间文化

费团结 陈一军 主编



三秦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与

XIN SHI QI XIAO SHUO YU
MIN JIAN WEN HUA

民间文化

费团结 陈一军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小说与民间文化 / 费团结, 陈一军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18-0907-8

I. ①新… II. ①费… ②陈… III. ①小说研究—中
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7725号

新时期小说与民间文化

费团结 陈一军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汉中聚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6 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907-8

定 价 38.00元

网 址 <http://www.sqcbbs.cn>

绪 论

新时期小说：从民间性到世界性

中国当代文学上的“新时期”，一般是指“文革”结束后至今这一时段。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仅以国内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来说，获奖作家作品就已相当可观。但对有理想、有追求的新时期中国作家来说，却普遍具有作品如何走向世界的深层焦虑。这也是普通中国读者的焦虑。每年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议，即是明证。直到2012年10月莫言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焦虑才得以大大缓解。但缓解的也许只是读者的焦虑，而非莫言以外的其他中国作家的焦虑。（莫言并非不再焦虑，他的焦虑也许是获奖后能否创作出不失水准的作品。）也许有人对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以为然，但获奖显然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中国新时期作家不一定非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作品如何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各国读者所阅读、所喜欢，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却是应该考虑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出身于农村、小说创作也主要以乡土民间文化为文学资源的中国新时期作家来说，如何使作品既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性、人类性，这更是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

一

纵观新时期小说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民间化叙事无疑是最为突出的艺术特征之一。新时期小说或者描绘民间的风俗习惯，或者引述民间的歌谣、故事，或者选用民间的方言土语，或者刻画民间人物的神采风姿，等等，不一而足。其对诸多民间文化事象和人物的精彩描绘，当代读者有目共睹。如果说陕北信天游高亢、苍凉的旋律随着路遥、高建群等作家作品的广泛传播早已名闻天下，湘西神秘的风俗也先因沈从文、后因韩少功等作家的巨大影响而被好奇者一窥究竟，那么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的风景、传说、人物等，就不仅仅为中国读者所熟知，更

是开始走向世界，为国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读者所了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小说不仅在题材内容上对民间生活文化景观大书特书，而且在叙事方式上也借鉴民间文艺的艺术方法，具有民间化的倾向。如贾平凹的《冰炭》对讲故事情境的模拟还原，他的《白夜》“后记”中提出的“小说是一种说话”的小说观念及其艺术实践（如《白夜》、《高老庄》、《秦腔》等），都可看到古老的民间故事的叙事艺术的影响痕迹。再如莫言的《檀香刑》，正如其“后记”所说，是一部有意识地向民间说唱艺术大踏步撤退的作品；而他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两部长篇，也都是向民间文学学习、向中国传统小说学习的产物。另外，像高建群的《古道天机》（后改名《最后的远行》）刻意追求赵树理小说和“三言二拍”的叙事语言风格，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在叙述节奏上主动向民间鼓书艺人学习，以及周同宾的《皇天后土》、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作品，对乡村农民讲故事的内容与形式的“口述实录”，都可看到新时期小说叙事方式民间化的具体表现。

新时期作家的民间化叙事，即小说创作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大量利用与生动表现，大致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强调作家所持有的民间文化立场，一是注重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吸收、借鉴。阿来曾谈及《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莫言也曾演讲《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两位作家虽然谈的都是文学的“民间资源”，但阿来着重在艺术借鉴上，谈到他的小说《尘埃落定》“从人物形象与文体两个方面所受到的民间文化的影响”^①；而莫言却强调作家的文化道德立场，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②。当然，作家的民间文化立场与民间文学艺术借鉴也是相辅相成的。具有民间文化立场，自然重视一切有益的民间文艺形式；长期浸润于民间生活文化氛围，勇于学习、借鉴民间的文艺形式，也易于建立起民间的文化立场。从新时期小说创作实际来看，大部分作家既具有民间文化立场，同时又热衷于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对民间叙事艺术的借鉴。

新时期作家对民间文艺、文化资源的热衷利用，既与新时期作家富有民间生活经历和文化素养有关，也与现当代文学的民间传统及其创作思潮的强大影响分

① 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不开。新时期作家构成中,出身于农村或具有相当长时间的农村生活经历的作家一直占有重要或主导地位。这些作家对民间文化在耳濡目染之下,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一旦他们拿起笔来从事创作,就自然而然地对民间生活文化景观加以表现。除了自身因素外,新时期作家的民间化叙事还受到现当代文学持久而强大的民间传统的影响。现当代文学的民间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四前后(1918—1925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学运动。1922年创刊的《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提到搜集歌谣的两个目的:一是学术的,即歌谣可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一是文艺的,即歌谣亦可为白话新诗创作提供参考材料。其中第二个目的表明新文学作家对学习、借鉴歌谣等民间文艺相当自觉,也可以说现当代文学的民间传统就此已初步确立。这之后,经过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和“文革”期间地下文学创作,鲁迅、老舍、赵树理等作家对民间文化的重视及其民间化创作的影响示范作用,现当代文学的民间传统已牢固建立。“文革”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门的打开,外国文学的创作流派、理论观念和作家作品被大量译介进来,处于新时期的中国作家出于艺术创新的需要,纷纷向外国文学学习,借鉴其技巧和观念,而对本土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弃之不顾,甚至有一种崇洋媚外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潮流的兴起,才又重新强调本民族的文学传统。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一般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理论宣言。在文章中他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还指出:“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①这种不规范的传统,其实就是乡土民间文化。在韩少功看来,它“更值得作家们注意”。显然,韩少功代表的寻根作家认识到了民间文化的价值,重新捡起了现当代文学的民间传统。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先锋小说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探索遭遇冷淡、集体转向以后,新时期作家更是看重包括民间文学、文化在内的本土文学传统了。新时期作家对文学的民间传统的重视,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功苦苦地寻找绚丽的楚文化的去向,到

^① 韩少功:《文学的“根”》,《韩少功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页。

新世纪初莫言有意识地向民间说唱艺术的大踏步撤退，这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一种艺术选择，其实也代表着新时期作家一种普遍的创作倾向。

新时期作家的民间化叙事，往往使其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并在小说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过去我们对赵树理的艺术成就，对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成就，一直都是这样评价的。具有鲜明的民间地域性、民族性的作品是否也具有世界性、人类性呢？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越是地域的民族越是世界的。针对这种观点，贾平凹表达了他的异议，他说：“我不同意‘越有地方性越有民族性，越有民族性越有世界性’的话，首先，这个地方性、民族性得趋人类最先进的东西，也就是说，有国际视角，然后才能是越有地方性、民族性越有世界性。”^①莫言也曾提出“超越故乡”的命题，认为作家只有发现故乡诸多独特性中所包含的普遍性，其作品才能冲出地区、走向世界^②。贾平凹和莫言都注意到了民族地域文学的世界性问题。那么，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地域性的新时期小说如何才能从狭隘的地域走向广阔的世界，并具有普遍的世界性、人类性，这确实是新时期的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创作难题。

二

新时期作家热衷于从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小说创作素材。民间文化既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其实也蕴含着某种世界性因素。如新时期小说对婚丧嫁娶人生仪礼风俗场面的大量描写，可联系外国小说中类似描写内容做比较民俗学的解读，从而挖掘出作品所具有的普遍人类性。这里仅从民间叙事文学的类型、母题和民间文化原型等方面入手，考察新时期小说如何因写到它们而具有某种世界性。

何谓民间叙事文学的类型、母题？借用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的解释，“母题”是指民间故事中能够持续出现在传统中的最小叙事成分；“类型”是指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民间故事，“组成它的可以仅仅是一个母题，也可以是多个母题”^③。

① 贾平凹：《答陈泽顺先生问》，《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② 莫言：《超越故乡》，《会唱歌的墙——莫言散文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244页。

③ [美] 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同样的母题和类型经常出现在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的民间故事中，因此可以进行民间故事类型比较研究或比较神话学、比较故事学研究。芬兰学者阿尔奈完成、美国学者汤普森补充修订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即“AT 分类法”）、美国学者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等著作，都是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刘守华曾指出：“在中国学术领域中，比较神话学、比较故事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已成为学人的共识，两者相得益彰。比较故事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将使比较文学园圃的花朵更为多姿多彩。比较故事学注重实证的学术传统和通过编纂故事类型索引、母题索引来处理大量资料的方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探索民间故事原型和传播演变历史的研究成果都值得比较文学家认真借鉴吸收。”^①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研究，包括题材研究、母题研究等。“主题学范畴内的题材专指在民族文化间具有共通性的典型事件”，神话、民间故事及其故事类型仍是题材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为主题学研究对象的母题，除了指“叙事句”的最小基本单位外，还指人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最小的意义单元，如“生死”、“战争”、“嫉妒”、“骄傲”、“季节”“秋天”等等^②。因此，民间故事的母题和类型，借助于比较文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更容易找出其世界范围内的共通性。

对于经常引述民间故事的新时期小说来说，由于所引民间故事具有的世界共通性，因此它可以凭此进入世界文学的流通领域，做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的交流。举例来说，中国各地流传的民间故事中，有大量的反映人与动物关系的民间故事，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收录、解析的“小鸡崽报仇”、“猫狗结仇”、“狼外婆”、“中山狼”、“蜈蚣报恩”、“义虎”、“义犬救主”、“八哥鸟报仇”、“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人心不足蛇吞相”等故事类型，都多少涉及了人与动物关系的问题。这类故事类型不仅大量存在于中国各省区，也大多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这类故事类型往往以核心母题命名，大多表达一个道德训诫主题，或者褒扬动物的恩义，或者谴责人类的贪婪、不义。这类反映人与动物关系的民间故事在中国新时期作家笔下有相当直接的表现。如张炜的小说《怀念黑

① 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 页。

②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0、228 页。

潭中的鱼》、《鱼的故事》、《赶走灰喜鹊》、《问母亲》等，都写到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借感恩的、奉献的鱼类、有益于人类的灰喜鹊或好心的狐狸等动物的故事，对比反衬人类的背信弃义、贪得无厌、虚伪狡诈和狂妄自大等品性，达到道德讽喻的目的。但正像这类民间故事在反映远古时期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时已经隐含着一种生态主题一样，张炜的小说也不仅仅表达了一种道德主题，其实还表达了对人类发展前途的生态忧思。与张炜小说类似，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也写到了动物报恩的故事，如作品写到猎人傅山曾救过一只金丝猴，它化身为一个黄发女人前来感谢。但小说主要叙写人与狼之间既斗争又依存的关系，进而隐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表达一种生态主题。这类反映人与动物关系的民间故事所隐含的生态主题，以及新时期小说对这一主题的深刻挖掘与表现，在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今天，显然更容易为世界各民族读者认同和接受。

新时期作家通过对民间文化原型的书写，也可到达世界文学的高贵殿堂，使作品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读者中取得心灵的共鸣。“原型”概念最早源于希腊文，其本意是原始模式或某事物的典型。在柏拉图的哲学理论中，原型意指事物的理念本源。两千年后，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内容。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着重从文学角度解释这个概念，认为原型“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是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的象征，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①。弗莱、荣格等西方学者注重从远古神话中寻找、分析原型及其转化或移位的象征形式，因此有神话原型批评的名目。鉴于中国上古神话琐碎、散乱、不成体系，国内学者提出民间原型的概念，强调从民间文艺作品和民间文化事象中分析归纳出原型来。神话一般也被看做是民间文艺体裁样式之一。因此，民间原型显然是神话原型的概念扩展和延伸。参考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认为，民间原型是指反复出现于民众日常生活、文化活动或文艺形式中的主题、母题、人物、意象、仪式、典型情境、结构模式、话语方式等，它们往往蕴含着民众普遍具有的心理内容、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荣格曾说“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

① [加]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2 页。

倾倒。与此同时，他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的力量。这便是伟大艺术的奥秘，是它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奥秘。”^①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主要是指反映集体无意识心理内容的神话原型。其实，那些书写民间原型的作品，同样“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具有成为“伟大艺术”的读者心理基础。

举例来说。荣格在《童话中灵魂的现象学》一文中论述梦和童话中的精神及其表征时，集中分析了“智慧老人”这一原型形象。在中外民间故事中，存在着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的机智人物故事，其主人公即为机智人物，像中国的阿凡提、徐文长、巧女和巧媳妇等，早已为国内读者所熟知。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像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朱先生，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高建群《六六镇》（后改名《最后的民间》）和《古道天机》（后改名《最后的远行》）中的张家山，池莉《不谈爱情》中的梅莹，《小姐你早》中的李开玲、艾月，《她的城》中的蜜姐等，这些人物都可看做是类似于民间机智人物的文学形象。阿来在《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一文中专门谈到他笔下的傻子少爷形象源于藏族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阿古顿巴。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其主人公布卢姆对应于古希腊神话人物尤利西斯（拉丁文名字，希腊语名字为奥德修斯）。尤利西斯足智多谋，是一位智者形象，因此布卢姆也具有智者的某些特点。布莱希特的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和剧作《高加索灰阑记》中智判二母争子案的法官多林格尔和阿兹达克，同其创作所受影响的中国剧作中的清官包公一样，都是智者形象。中外民间故事、作家作品中的智者形象，表现的都是人类追求智慧、歌颂智慧甚至崇拜智慧的文化心理。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小说也不例外。

除了动物感恩母题和智者原型外，新时期小说还经常写到还乡母题（如莫言《白狗秋千架》、贾平凹《高老庄》、阎连科《风雅颂》等），浪子及其启悟成长母题（如史铁生《命若琴弦》、贾平凹《废都》、王安忆《启蒙时代》等），桃花源或乌托邦原型（如汪曾祺《受戒》、阎连科《受活》、周大新《湖光山色》等），英雄

^① C. G. 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原型（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贾平凹《浮躁》中的金狗等），父子冲突母题或原型（如余华《活着》中主人公富贵与父亲的冲突、陈忠实《白鹿原》中黑娃、白孝文、白灵、鹿兆鹏等与父辈的冲突），等等，这些母题和原型都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共通性，因此表现它们的新时期小说自然也就具备了某种世界性因素。

三

新时期小说对民间叙事文学的类型、母题与文化原型的书写，因所表现对象的人类共通性或世界普遍性，因而自然具有某种世界性因素。但作家文学毕竟不同于民间文学，相比于民众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更注重个人的创造性。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其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如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与开篇》中所说：“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但是，作为“影响的焦虑”这个批评概念的首倡者，布鲁姆又不忘文学传统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他说：“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即一种令人烦恼并难以理解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出现。”“伟大的作品不是重写即为修正，因为它建构在某种为自我开辟空间的阅读之上，或者此种阅读会将旧作重新打开，给予我们新的痛苦经验。许多原创作品并非原创，而是爱默生式的反讽让位于爱默生式的实用主义：创新者知道如何借鉴。”^①布鲁姆强调了伟大的前辈作家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但却未注意到无名作者的民间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家创作面临的文学传统，显然既有作家文学传统，也应包括民间文学、文化传统。因此，作家创作实际上是在汲取、借鉴各种文学传统基础上的一种个人创造，其作品往往是个人创新与传统继承相互调和的结果。在这里，传统继承与个人创新缺一不可，这也是成就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关键所在。

前面我们已经论析了新时期小说如何通过民间文化传统的重视和借鉴而具有某种世界性，下面我们着重探讨一下新时期作家如何在创作中、在传统的继承中发挥自己的主观性、创造性，从而成为具有走向世界可能性的伟大作家。作家在创作中总会发表自己对于时代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看法。作家不能不关注于自

^① [美国]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8 页。

己身处其间的时代生活及其典型问题，这使得此时代的作家作品与彼时代的作家作品面貌各异。作家也经常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生平经历、性格爱好、文化修养和世界观、人生观等，因此即使是表现同一题材或主题的两部作品也大异其趣。新时期作家在对母题、原型等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常常加入个人的人生观念、生命哲学和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因而民间母题和原型就并非是原样照搬进入作品，而是一种重造、一种创新，借用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的话说就是“置换变形”。

新时期小说中的变形情节，就是这样一个“重造”的母题或原型。古希腊神话中关于变形的故事，奥维德专门著有《变形记》，描写神和人的变形。中国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等故事，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传说，也都存在变形的情节。变形情节的背后，往往蕴含着人类畏惧死亡、逃避死亡的深层心理。卡西尔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由于对生命的不中断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念，神话必须清除这种现象。”^①古代人类不相信人终有一死，因此常以变形代之。后世作家作品也常常写到变形故事，但显然在其中注入了时代生活经验和个人生命思考，因而艺术面貌大大有别于前。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写到人变成甲虫，作者借此批评了资本主义金钱社会对人的异化。中国新时期作家笔下的变形故事又有所不同。如贾平凹的《白夜》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都写到了人的变形，前者写主人公夜郎变为“鬼”、小说人物祝一鹤变为蚕、宽哥变为甲虫，后者写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枪毙的西门屯地主西门闹满腹冤屈，不愿做鬼，在半个世纪里分别投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重返人间。前者人物的变形并非真变而是形似，作者借此隐喻包括政治权力在内的生活欲望对人的异化，或借人的异化批评政治体制的弊病和社会风气的堕落，创作意图与卡夫卡的《变形记》一脉相承，但其中更含有城籍农裔作家对城乡文化价值和前途的思考；后者借助佛教六道轮回的观念，以独特的视角叙述了半个世纪的当代历史生活变迁，同时表现了一种执拗的人性和人类强大的生命力，人物变形虽近于古代神话观念，但其中蕴含的作者

①【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108页。

对当代历史的独特反思和对人性的深深悲悯与同情，却是独一无二的。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到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虽然都写到了变形这一民间文化母题或原型，但却是各有创造、各有发展，展现了新时期作家丰沛的艺术创造力。

新时期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也是一个“重造”的原型人物。这在莫言的《丰乳肥臀》、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等小说中都看得很是清楚。作为一种文学原型，母亲形象最早源出于人类远古的神话故事中，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亚、中国神话中的创世女神女娲等，都是最早的人类母亲形象。母亲原型也不断复现于后世的民间传说、故事等文艺形式和作家作品中。荣格曾在《母亲原型的心理学面向》一文中专门论析了母亲原型。他的学生埃利希·诺依曼在其专著《大母神——原型分析》中，更是就大母神原型的内在生成机制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神话、艺术和文化中的表现做了详尽的分析。不管是荣格，还是诺依曼，都论及了原型母亲的双面性或双重性，即母亲一方面具有善良、可爱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带有邪恶、恐怖的特征。用荣格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母亲”。莫言《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形象主要是一位积极的正面的形象。据莫言解释，他之所以创作这部小说，源于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在一次美术欣赏课上看到的一尊母系社会时期的体现生殖崇拜、母性崇拜的丰乳肥臀的女性石雕像照片，正是这尊远古时期的女性雕像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①。由此可见，莫言笔下的母亲形象与远古时期的大母神或母亲原型有着内在的联系。另外，据莫言解释，他笔下的母亲形象更有自己母亲的影子，他的小说也是母亲的颂歌，“是写一个母亲并希望她能代表天下的母亲，是歌颂一个母亲并企望能借此歌颂天下的母亲”。古往今来，多少作家、诗歌都歌颂过伟大的母亲。莫言与他们有何不同呢？莫言的独特性在于他强调了母亲的生育性及其苦难。2000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莫言罗列了母亲一生的苦难，首先列举的便是生育。因此，在《丰乳肥臀》一开始，作者便突出描写了母亲上官鲁氏生育她的双胞胎时的难产，并与她家毛驴的难产相对照，写出了人不如驴的母亲的卑贱命运。小说还写到上官鲁氏为了给夫家生出一个儿子传宗接代，不断地偷人借种，连续生下七个女儿，每一次生育都是一次屈辱和苦难。莫言对母亲生育苦难的描写，其实象征性地写出了中国农村妇女

① 莫言：《〈丰乳肥臀〉解》，《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普遍的苦难和命运。

与莫言相类似，田中禾的小说《父亲和她们》也刻画了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肖芝兰。田中禾曾在创作手记中说：“‘娘’这个形象很多地方借鉴了我母亲。我母亲管教我，用的是她没有底线的爱，不计利害的付出。……她那么善良、宽宏，坚韧、智慧，忍辱负重，一次次从危难中拯救伤害她的那个‘不讲理的’‘浑货’，她是这本书中最完美的形象，几乎可以说是马家的圣母，曾让读她的朋友感动流泪。”^①因此，田中禾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首唱给母亲的颂歌。但是，与莫言略有不同的是，田中禾也刻画了母亲的消极、负面的形象。小说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母亲，其实扮演着政治上对父亲改造的帮凶的角色，最终把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改造成了驯顺的奴才。作者显然对母亲形象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批评。田中禾笔下的母亲形象由此显示了她复杂的面孔，既暗暗对应着原型母亲的双重性特征，又承载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爱恨交织的复杂思考。

新时期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使得其在借用民间文化母题和原型等文学资源时各取所需、各不相同，显出了各自的思想深度和叙事特色。作家在思想、艺术上的创造性，这既是新时期作家相互区别的个人标志，也是他们超越前辈作家的可贵之处。新时期小说正是由此而不断发展，并从狭隘的地域民间走向广阔的世界。当然，新时期小说是否能够走向世界，其原因是复杂的，像小说翻译的问题、文本改编及传播方式的问题、读者阅读时尚的问题、民族文化心理差异的问题等等，都应该考虑进来。我们只是从新时期小说文本内部一个具体的内容要素，考察了其走向世界的可能性。新时期小说走向世界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这是应该注意的。

最后谈一下本论著。本论著主要以新时期小说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为论述范围。除绪论和结语两部分外，前后共有七章。第一、二章由浅至深地论析了新时期小说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具体来说，就是先分析了民间文化如何影响了新时期作家的审美观念和叙事立场，从而使他们在创作中大量地直接描写民间文化事象或景观，并使其具有丰富的审美意义。然后，深入分析了新时期作家对民间文化

^① 田中禾：《在自己心中迷失》，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1页。

原型的创化性运用,探讨其作品所具有的世界性因素。为了避免泛泛而论,特选取贾平凹、周大新、高建群、田中禾、池莉、阎连科、陈忠实等作家及其作品,从不同侧面或角度切入,力求分析有所针对,观点有感而发。第三、四、五、六章选取两位著名的新时期作家张贤亮和路遥,分别详细、系统地论析了他们利用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民间化叙事的一般概况和各自特点。第七章选取一个特定的地域——汉水流域,分析了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民间化叙事的概况、特点及普遍存在的问题。本章虽属宏观分析,但具体论述时也多依据相关作家作品,力求观点落到实处。本论著重点分析的几位作家虽然都出于中西部地区,但在新时期文坛上都属于著名作家之列。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论著某些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目 录

新时期小说与民间文化

绪 论 新时期小说：从民间性到世界性 / 001

第一章 新时期小说的民间化叙事及其审美意义 / 001

第一节 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民间化叙事倾向 / 001

第二节 民间戏曲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 / 012

第三节 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民间传说及其意义 / 022

第四节 高建群《大平原》的民间化叙事及其个性 / 028

第二章 新时期小说与民间文化原型 / 039

第一节 田中禾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其原型 / 039

第二节 池莉小说中的女性智者形象及其原型 / 051

第三节 阎连科《丁庄梦》的乌托邦叙事 / 058

第四节 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民间原型及其世界性 / 063

第三章 西北文化与张贤亮小说（上） / 074

第一节 张贤亮小说展现的西北高原自然风貌及其美学价值 / 075

第二节 张贤亮小说中的西北物质生产生活民俗及其意义 / 080

第三节 张贤亮小说中具有西北风格的人物形象 / 086

第四章 西北文化与张贤亮小说（下） / 097

第一节 张贤亮小说展现的丰富的西北民间艺术及其意义 / 097

第二节 张贤亮小说中西北方言的运用及对小说语言风格的影响 / 103

第三节	张贤亮小说体现的西北文化精神 / 108
第五章	陕北民间文化与路遥小说创作（上） / 115
第一节	陕北黄土高原的文学世界 / 115
第二节	陕北民俗文化的极力呈现 / 117
第三节	路遥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情感和民间意识 / 139
第六章	陕北民间文化与路遥小说创作（下） / 143
第一节	民间话语和主流话语的交叉与冲突 / 143
第二节	从民间文化角度看路遥小说的浪漫主义特征 / 149
第三节	地域民间文化与路遥小说的受众性 / 157
第四节	民间文化意识与路遥小说创作的优长与局限 / 162
第七章	民间文化资源与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创作 / 165
第一节	小说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景观 / 165
第二节	民间文化原型及其重构 / 175
第三节	民间文化所具有的审美意义 / 186
第四节	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 / 193
结 语	几点结论和一个研究趋向 / 200
参考文献	/ 202
后 记	/ 208